

第一章

魏晋以来儒学的存在状况

东汉末期，以经学为代表的儒学的发展出现了危机。经学中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谶纬神学体系走到了尽头，以章句训诂为主的繁琐经学衰落了。与此同时，各种社会思潮纷相竞起。在汉末各种社会思潮中，以名法思想及黄老思想的复归为主流，形成社会批判思潮，其着眼点为拯救时弊，即汉末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危机，儒学作为长期以来政治指导思想却无所作为，当时之有识之士便援引名法及黄老思想补充儒学之足，企图整饬政治。

新思潮一发便不可收拾，名法思想及黄老思想沿其内部逻辑演进，发展成名理思潮之玄学思潮，并迅速发展成为魏晋时代之主流思潮。玄学在发展过程中又与外来学术佛学相结合，不仅推动了佛教及佛学的发展，也使得玄学本身佛学化。相对而言，儒学的发展则进入一低谷时期。这一时期儒学所表现的特点是：儒学一统天下的时代一去不返，儒学其独尊状况虽然受到冲击，然而仍然保持了正统地位，以经学为代表的儒学学术形式自汉末衰落以来，魏晋时仍然不振。其表现为：首先，经学不受

官方及士大夫们所重视，官方经学——学校失去了学术中心地位，一衰再衰。其次，两汉以来标志经学兴盛的师说传承、家法林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各种师说、家法丧失殆尽，经学传承苟延残喘，不绝如缕；再次，玄学与佛学的崛起，冲击儒学经学传统，玄学经学是对旧经学的反动。

经学虽然衰落不堪，但其作为官方正统学术的地位得到保持，在冲击与曲折中寻求发展。首先，经学以章句注疏的形式在学术上依然传承不断；其次，逐步肃清了谶纬神学的影响，向理性方向发展；再次，魏晋时期经学著作间有所出，在内容上有所创新与突破，显示出经学内部寻求发展的尝试与努力。

玄学是魏晋时期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潮，在社会、政治、学术等各个领域的影响意义深远。玄学的产生为中国传统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玄学以《易》、《老子》、《庄子》为主要研习经典，在思想上突破了许多旧的传统，树立了本体论的新理论，在中国哲学发展、思维演进方面，取得很大发展。然而在玄学思想体系中，仍然尊孔子为圣人，为最高之理想人格，也无法否定儒家之纲常名教思想，而是企图调和其所崇尚的自然与儒家名教的关系，证明名教的合理性。由此可见，魏晋时期思想界的大变动、大调整，并没有动摇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儒学的基本观念仍然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并支配着人们的行为。

第一节 经学的危机与衰落

东汉后期，儒家经学开始显现出衰落迹象。在经学内部，自汉武帝表彰五经、确立其独尊地位后，经学迅速发展，同时也积累了一系列问题。东汉时期经学自身的问题日益突出，表现为

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学的谶纬神学化。谶纬之学自王莽及光武帝的宣传利用后迅速蔓延，也影响了经学，导致经学谶纬化，使得经学中充斥着各种迷信、怪异、神秘的内容，进而将经学庸俗化。第二，经学的繁琐化。汉代经学株守师说家法，代代传业，形成枝叶滋蔓、章句繁琐的状况，动辄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繁琐的章句训诂之学，势必导致经学整体上的支离破碎，而造成学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①，即所谓‘皓首穷经’的困难局面。第三，经学的歧义化。汉代经学重师说家法，一经有数家之分，一家又有数说，学者严守门户。而章句繁琐，支离破碎，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不能统其大意。在一经中各家师说家法纷异，经学严重歧义化，在理论上无法贯通。由此可见，经学在其发展的繁盛中，自身内部已经孕育着危机。汉代经学的以上发展倾向，使得经学日益脱离实际，自身的发展受到阻碍，找不到其进展之路与发展方向。

同时，汉代官方经学也显示出衰落之态。自汉武帝置太学，立五经博士，教授学生，以经学取士以来，官学的发展高潮迭起。经学各家师说争入官学，博士名额也一增再增，东汉时达十四家。太学生队伍不断扩大，由汉武帝初置时的五十人，逐步增加至东汉顺帝时的三万人。可见官学经学发展之盛，其规模一扩再扩。并且，太学形成经学之学术中心，国家尊崇官学，在太学中领众教授之博士，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很高，导致汉代时各家师说争入太学，有志少年也往往游学太学，形成太学在全国经学中的学术中心与领导地位。但到东汉末期，官学开始衰落，史载：“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顺

① 《汉书》卷 30《艺文志》

帝时学虽增盛，而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衰矣。^①

官学的衰落是经学发展内部危机的表现，同时也是官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官学繁盛的表面之下，一个重要的动机是利禄的诱引。朝廷以官禄而劝学，民众以利禄而习经，官学成为登进荣显之阶梯。因此，“儒之途通，而其道亡”。太学生不以道德修养、砥励志尚为习经之目的，而志在仕途之显贵。东汉末期太学生虽增盛至三万人，而不能以学业为务，只是朋党交际，浮华相尚。官学的变质使得不仅没有发展前途，而且脆弱不堪，一遇变故，便颓然而溃。在东汉的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官学更是受到重创，从此一蹶不振。

在儒学外部，汉末时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冲击儒学独尊地位，造成儒学统治的危机。东汉末年，外戚干政，宦官专权，皇权失驭，朝政日趋颓败，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积累得不到解决。面对如此腐败的政治现实，西汉以来以天人感应、灾异谴咎学说为主的经学思想一筹莫展，其所宣扬之谶纬、灾异得不到验证和实现，无法对现实社会政治矛盾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于是在士大夫阶层中，一些忧国忧民之人，试图从儒学外部来寻找能拯救时弊的方法和理论，来弥补儒学不足。王充、桓谭、扬雄、王符、崔寔、仲长统等人都著书立说，批判现实政治，形成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在他们的著作中，严厉批判了汉代儒学的天人感应神学思想，揭露了谶纬神学之荒谬。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大多借用了黄老、名法思想来充实改造儒学，于是揭开了魏晋南北朝学术大变革、大发展的序幕，从而使传统的章句注疏式的旧经学更加衰落。

① 《后汉书》卷 79《儒林传》

东汉以名教治天下，在官吏选举中以察举和征辟为主，以经明行修的儒学名教来评判取士。但在东汉末年，名教之治发生动摇，朝纲颓弛、政治日益腐败，名教不能维系人心，选举名不符实。因而，乡间清议的人物批评开始受到重视。在清议的推动下，品评人物、循名则实的名学发展起来，清议逐渐转向清谈，其内容由品评人物转向名理之学再转为玄学清谈，于是名理思潮、玄学勃兴，士大夫们的兴趣日益转向新学，这也导致了传统经学的衰落。

魏晋时期经学衰落的趋势没有改变，汉末时期官学——太学受到打击后一蹶不振，私学的教授传承仍在继续。郑玄遍注群经，兼采名家之说，融通古文、今文之学，打破了师说家法门户标立、各不相通的局面。郑玄遂成为一代大儒，由此而出现的郑学成为汉末到魏晋经学的圭臬，而其他各家师说家法式微，至魏晋后丧失殆尽。

魏晋时期，《易》学发达，然而汉代立于官学的施氏（施雠）、孟氏（孟喜）、梁丘氏（梁丘贺）、京氏（京房）之《易》传习甚少，日益失传。梁丘、孟氏之《易》亡于西晋。孟氏、京氏之《易》学到南北朝时期亦是有书无师。汉代流行民间的费氏《易》，汉末较盛，马融传其学，后授郑玄，郑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曹魏时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费氏《易》而成为魏晋《易》学之主本。其中二者的区别为：郑玄之《易注》仍株守汉代象数《易》学之特色，而王弼则承扬魏晋学术之变迁，成就《易》之义理化、玄学化的新学——玄学经学。其他汉代各家师说亡亡。

汉时《尚书》有欧阳氏（欧阳高）、大小夏侯（夏侯胜为大、夏侯建为小）三家并立官学。孔安国所述之《尚书古文》之学并未立官学。但后郑玄为《尚书古文》作注，杂以今文，并非仅为孔安

国旧文，一时盛行。至西晋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东晋时，梅赜献伪孔安国古文《尚书》。至南北朝世所行《尚书》，北方以郑玄注为主，南方仍以伪孔安国旧传为宗，其他师说绝亡。

汉代《诗》有：《鲁诗》。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而作训诂；《齐诗》。齐人轅固生所传《诗》；《韩诗》。燕人韩婴所传。三家并立于官学。另有《毛诗》。传承于民间。至汉末《毛诗》兴盛，郑玄作《作诗笺》。《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魏晋至南北朝时虽存而无师传，只有《毛诗郑笺》。魏晋时留存传承。

《礼》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分发达。汉时，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氏、庆普三家并立学官。又有《周官》。于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汉末马融传小戴《礼记》，又有所编定，同时作《周官传》。郑玄受业于马融，郑玄作《周官注》及《小戴礼记注》并注《仪礼》十七卷。魏晋时，《礼》学大盛，均以郑玄之学为宗，而其他师说家法并多散亡，或无师传。

东汉时《春秋》之学，《公羊》有严氏、颜氏两家之学与《穀梁》三家并立于学官，而《左氏春秋》则流行于民间。汉末，何林作《公羊解说》在魏晋时流行于北方。《左氏春秋》汉末有贾逵、服虔并为训注，服虔之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流行北方。西晋时，杜预著《左氏集解》。至东晋在南朝流行于东。东晋时范宁还撰有《春秋穀梁传集解》。但总体来说，魏晋时期惟有《左传》师传习读较盛，《公羊》、《穀梁》少有能通其义者。

《孝经》在汉代有古、今学之分，后孔安国为古文《孝经》作传，郑众、马融并为之注，相传亦有郑玄之注本。孔安国注本亡于南朝梁时。

《论语》汉代有《齐论》与《鲁论》之说，后又有古文《论语》。孔

安国为之作传。郑玄以《鲁论》之《张侯论》(张禹所删定之本为本参考《齐论》和古文《论语》而为之注。曹魏时何晏又作《论语集解》,《齐论》遂亡。南北朝时 郑玄注流行于北方 何晏注流行于南方 其他师说殆尽^①。

由上可见,汉末至魏晋以来,经学师承虽传延不断,然而汉代以来师说纷立的局面彻底结束,各家学说纷纷走向衰微之路,灭绝殆尽。许多连本而亡,少量留存者有书无师。世所传承者以汉末之郑玄学说为主,杂以魏晋新出之注。然而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传授规模、习经人数上都大大下降,无法与汉代相比。因而,经学的衰落不待自明。

自东汉末年官学太学受到党锢之祸重创后,一蹶不振。魏晋时,学校式微的状况一直得不到扭转,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是一衰再衰,以至学术中心也由官学转移至私学。特别是魏晋时期,士族门阀开始形成,世家大族重视家学传承,学术转入家内。官学成为统治者徒应故事、附会正统之工具。往往在王朝初建时,建学置博士以象征其正统所在,但不能坚持,一遇变故,就废而不存。朝廷既不重视,当然也无劝学奖掖之举措。此非登进之途,士大夫亦不以经学为务,学校不兴,当在情理之中。

如曹魏时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然而却是“太学初立,有博士十余人,学多褊狭,又不熟悉,略不亲教,备员而已。”^②可见太学虽立,而博士粗鄙、生徒不精、学业不劝,徒具文饰作用,因而经学自然不振。此后,西晋武帝于咸宁四年(278)立国子学,晋

① 以上均参考《隋书》卷 32《经籍一》

② 《三国志》卷 16《杜畿传》裴注引《魏略》。

代学校分国子学与太学两级以别贵贱，置博士十九人，教授生徒。然而西晋世风专以玄学清谈为时尚，劝学之举亦有名无实。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学校更是废弛不修，经业亦不能振兴。官学的衰落不振、不受重视，充分反映出这一时期儒家经学衰落不振的状况。

同时，魏晋也是一个学术变迁的时代。这一时期，玄学开始发展兴盛起来，这为中国思想学术增添了新的内容。但玄学的兴盛也造成了儒学经学的危机与衰落的加深，因为从根本上说，玄学是对汉代以来繁琐章句经学的反动，因而对这一时期传统儒家经学发展的冲击与影响十分巨大。

玄学之发端，一方面起自经学内部《易》学的发展变迁。汉末《易》学的发展中出现言性与天道、注重义理研究的《易》学“新经义”派，即荆州学派，以宋忠《易》学为代表，另有虞翻、荀爽等。有别于旧的汉代传统的象数之学，他们喜张异议，删芟繁重，是东汉以来新学之发端。王弼之学与荆州之学有着密切关系，是新学之延展^①。

另一方面，汉末之清议，即人物品评之学于汉魏时形成名理思潮。名理之学，品评辨别人物，要求循名则实，改变汉末选举名不副实之状况，并破除一些刻情修容、伪行沽名的虚伪人物，因而识鉴人物极其精微。识鉴人物要求不以形貌皮相而在得其神理，遂成为只可意会不能言宣之体识，因而言意之辨起于识鉴，而玄学系统的建立有赖于此^②。这样，清议遂发展为清谈，助长了玄学理论之发展。

①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p.85。

②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p.27。

玄学以研习《易》、《老子》、《庄子》为主，总称三玄。讨论本末、有无、体用问题。王弼通过注《易》建立起本体论，这比之汉代宇宙构成论在哲学思辨上迈进一步，取得了发展。然而玄学重天道性命，其研习经典，大异于经学，对传统儒家经学无疑是一打击。玄学还重抽象的玄理，对儒学中的主要内容伦理道德、纲常名教则视为末端，因而不受重视。儒家经典亦遭轻视，史载：

“(荀)粲诸兄并以儒术议论，而粲独好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而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①

这种玄风盛行、注重天道性命，而以儒家典籍六经为圣人之糠粃、先王之陈迹的看法和倾向，真实地体现出魏晋时代玄学兴盛及对儒家经学的冲击。

玄学对世人思想观念上的冲击亦十分巨大。这一时期，士人思想解放，自由主义、浪漫主义高涨。他们不遵守儒家礼法，性率任达，狂简放荡，与汉代士人经明修行、以儒家名教礼法为行为准则来博取名声的情形大相径庭，形成强烈对比。魏晋士人不仅行为放荡，而且在学术生活中喜尚清谈、讨论玄学名理诸问题。在政治生活中，不以世务婴心，鄙视实际政治事务，专以清谈高论为尚。士人之清谈聚会、通脱放达之事在《世说新语》中俯拾皆是。可见，玄风畅演对人们观念心态影响巨大，在思想上冲破了旧学之樊篱，形成一时之思想解放运动，对汉代以来儒家之名教思想统治提出挑战，使儒学的统治地位出现危机。

① 《三国志》卷 10《荀彧传》裴注引何劭《荀彧传》。

第二节 经学的变迁与发展

魏晋时代玄学的产生与发展，虽然使得自汉末始衰的经学更趋势衰落，然而，汉代旧经学传统的巨大影响仍然存在，儒学经学仍保持传延不绝，并间有新作出世，处于缓慢发展及选择调整过程中。经学的玄学化，即玄学经学，就是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在理论上探索向义理化方向发展的尝试，是儒家经学调适发展的表现。

汉末，官学经学衰落，各家师说式微，但民间私学讲授仍然有所发展。郑玄作为汉末经学大师，兼采今、古文之学，参合融通各家师说，遍注群经，蔚为大家，成就了其一代宗师之经学学术权威地位，自魏晋至隋唐，经学无不受其影响。因而在魏晋时期，在经学发展上，依然以郑玄学为宗，郑学被习经者奉为圭臬，形成经学主流。然而就在这种形势下，仍然有人敢于挑战权威，树立新义，这就是王肃。这在客观结果上，推动了经学的发展。

一、王肃及其经学

王肃为曹魏司空王朗之子，他不但通经，还著有《易传》。史载：王肃“善贾逵、马融之学……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①王肃遍注群经，企图建立自己的经学权威。其经学的特点，首先是以贾逵、马融之古文经学为本，综合郑玄之学及兼采古文、今文，为混淆家法、打破师说之综合经学。其次，王肃经学十分注重礼学，这与时代正好和拍，是

^① 《三国志》卷13《王朗传附王肃传》

门阀士族势力发展的反映。再者，王肃经学还注重义理，他借重《易》、《老》引道人儒经弥补传统经学对哲理探求之不足这也是王肃经学明显之时代烙印。最后，王肃为树立自己经学权威的地位还伪造了《孔子家语》、《孔丛子》、《圣证论》等书为自己的经学立论提供根据^①。

王肃经学的出世，就引起经学史上著名的“王郑之争”。这场争论不仅是在学术上注经水平及正确与否的较量，而更多地渗入了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与曹氏的政治斗争内容，成为他们争权之思想工具。因此在西晋时，王肃之学兴盛一时，被立于学官。然而到东晋时除《易》为王弼所注外其余国学所立均为郑玄之学。在北方，由于西晋政权的瓦解，从十六国至北朝，郑学一直为经学主流。“王郑之争”最终结果是郑学压倒王学。之所以有如此的结果，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郑之争是训诂章句之学内部的斗争，王肃之学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所创新，但其治经之方法与郑学无异，并没有突破章句注疏之学旧体，没有能够创造出新的理论体系，其成果只能是对郑玄经学的修正与补充，再加上政治上的原因，因而王肃经学最终不能够战胜郑玄经学。

王肃经学的意义在于，首先，推动了儒家经学的发展。王肃遍注群经，挑战郑学，在学术界形成对经学的辩论，推动经学研究之新高潮，这无疑有利于经学的发展有利于经义的贯通。其次，王肃经学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订正、修改了郑玄经学的错误与疏漏。如在圆丘与郊祭的关系上，郑玄认为是祭昊天于圆丘，祭上帝于南郊，同样方丘、北郊也分为二祭。王肃则认为，圆丘

^① 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p 61。

郊祭同为祭天，实为一也。方丘与北郊祭地祇亦为一也。西晋及东晋南朝祭祀制度即采用王肃之说，显然王肃之说较为妥当。再次，王肃经学中重义理的倾向，是对传统汉代经学向理论化、义理化方向发展所进行的新的探索，虽然其影响十分微弱。但对于传统经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二、杜预及其经学

西晋时杜预对《左氏春秋》的撰述是魏晋时期经学发展之一大成果。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是西晋开国元勋之一。官至镇南大将军，封阳县侯。杜预自称有“《左氏》癖”，其经学成果自然多集中于《左氏春秋》方面，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春秋世谱》七卷、《春秋解例》十五卷、《春秋左传音》三卷、《春秋左氏评传》二卷等。其中以《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为代表作。其特点为：首先，将《春秋》与《左传》按年相配合而释之，以传解经，视经为史。其次，他对《左传》中义例的阐发和强调十分突出。义例分两种，即凡例与变例。杜预在《自序》中云：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失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辞发大义，谓之变例。”

其目的为“推变例而正褒贬。”^②杜预阐发和强调《左传》之凡例、变例，正是突出孔子修《春秋》之正王道、备人伦之目的，即“使乱臣贼子惧”，从而维护王道纲纪及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名

① 《晋书》卷34《杜预传》。

② 《春秋左传集解》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p.1705、p.1706。

教之治的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

杜预治《春秋》呕心沥血 用功极深 因而其《集解》精密完备。他继承了汉末以来《左氏春秋》学兴盛之趋向，在传统之上又有所开创，使得其《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生命力，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东晋南朝的时期，杜预之《春秋左氏》列于国学 盛行于南方 后又为唐代官方所修《五经正义》所采纳。最为重要的是，杜预之学“有清醒的理性主义倾向，而少汉儒神秘主义色彩。”^① 反映出经学自身发展变化，即向理性化的迈进，为儒学之理论化、哲理化做了一定的准备。

三、荆州学派及王弼、何晏之玄学经学

汉末《易》学之发展变迁 出现了重义理、扫繁重的新学派，即荆州学派。在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地区，学士云集，以宋忠为代表 他们的经学撰著不拘守汉旧注 其注《易》简约明析 显示出义理化倾向。而同时 他们都十分重视扬雄之《太玄》 注重探索天道性命之问。这一学术派别，引起当时人们的广泛关注，受其影响 许多人开始重视治《易》、研读《太玄》。如魏之王肃“年十八 从宋忠读《太玄》 而更为之解。”^②王弼之家学渊源与荆州学派也有密切关系，因而荆州学派之新学至魏晋时，经过王弼阐演 而成为玄学化之《易》学 这样 从学术内部嬗变中发展出玄学经学。当然，这并非玄学产生的唯一途径，玄学的产生，与名理思潮之兴起、黄老思想之复兴，以及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也

^①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p.629

^② 《三国志》卷 13《王朗传附王肃传》

有密切的关系。

玄学经学是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周易注》是玄学经学的代表作。《论语集解》是何晏与孙邕、郑冲、曹羲、荀凯、诸人杂采众说编撰而成，但以何晏为主。梁皇侃云：“何晏因《鲁论》集季长、马融、郑七家，又采《古论》孔注，又自下己意，即世所重者。”^①因而其中体现了较多何晏自己的思想。何晏的思想儒道兼综，引入道家思想来阐释儒经，以老解礼，内道外儒。何晏立论“以无为本”，认为“无”生“有”，因而贵“无”，他虽然没有建立起本体论的哲学体系，但已经对本末、有无问题作了探讨，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王弼之《周易注》以古文费氏《易》为底本，一扫汉代象数之学，援《老》入《易》，阐述行而上之学，简约明快，前后一贯。他借助儒家经典，阐发和建立了自己新的哲学理论体系——本体论。其方法是利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建立本体论的理论体系，以“无”为本，而将儒家理论道德、纲常名教视为末，主张以“无”为本，举本存末。虽然勉强容纳了儒家名教思想，但在其理论体系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并不受重视。

何晏、王弼之玄学经学重在开创玄学体系，借助儒家经典，而阐发他们自己的思想，其重点不在疏通经义，而在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因而体现出更多的玄学，而并非经学成分。

可见，玄学经学虽然以注疏儒家经典的面目出现，但实际内容却与传统经学大相径庭。它是经学试图建立理论体系、义理化的探索，是魏晋经学努力寻求发展道路的体现。然而，玄学经学不能以阐发儒家仁义道德、地悌忠恕等思想为重点，实际已经

^①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序》见《知不足斋丛书》[清 鲍廷博辑刻。

走向了经学的对立面，虽在理论方法体系上有所创新，却无法帮助复兴儒学。

总而言之，魏晋时期儒家经学在衰落中仍有所发展，这是经学自身进行调整与变革的表现。这一时期经学发展变化的趋势为首先表现为经学注疏中 讖纬神学、灾异等神秘主义的内容逐渐淡去。郑玄之学还间或引纬书解经，但王肃经学本于古文经学，以及杜预治《春秋》，均有淡化灾异神秘内容的倾向。其次，在玄学经学的影响下，经学烦琐章句之学的面貌有所改变，学者治经逐渐以疏通经义为务，虽然再没有以阐发大义为旨，但学者注经往往以一种注本为主，参考其他注本，来疏通大义，而达到明经的目的。这种倾向在南北朝时发展为义疏体经注，有利用学者对经义之把握，也有利于经义的贯通。此外，这一时期经学在玄学的影响下，玄学化倾向明显，常常以玄解经，这是经学在理论化道路上，在方法论上的探索与积累。在魏晋时期经学虽然衰落不振，但同时也是其自身寻找发展出路、调整以往发展偏差、为唐代以后儒学的复兴积累经验作准备的时期。

第三节 玄学及其与儒学的关系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流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这一时期最具活力、最具智慧的思想学术，在中国哲学史上，玄学之理论体系——本体论，在思维水平上超越汉代之宇宙生成论而达到一新高度。

一、玄学的兴起

玄学的形成与汉末学术变迁、思想解放、士人对现实政治的关切

及试图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努力密切相关^①。在玄学的发展过程中，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何晏、王弼之玄学。他们提出“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哲学本体论，主张“举本存末”，重视本体“无”。政治上要求统治者清静无为，同时也不反对儒家名教之治（即“有”），维护封建统治的君臣名分、等级秩序。但是何晏、王弼的哲学，在总体上强调“以无为本”，贵“无”，强调道家之无为与自然，这为后来学者否定名教、主张“任自然”的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作了准备。

（二）阮籍、嵇康的玄学。他们崇尚老庄、崇尚道家“自然纯朴”，反对虚伪巧饰的儒家礼教，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是玄学中的激进派。阮籍的著作中充满了对当时社会政治现实不满的情绪，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薄汤武而非周孔”的激烈言论，都是针对司马氏的虚伪的儒家说教而发，是他们“济世之志”无法实现的怨愤的表现，从而也成就了一代通脱放达之风气。

（三）西晋中后期的玄学，包括裴頠、向秀及郭象，这一时期是对玄学发展方向的修正。裴頠著《崇有论》，以崇“有”来纠正贵“无”派发展为虚无放达的倾向。认为“无”不能生“有”，“有”是自生的。其目的在于维护儒家名教的社会权威，反对通脱、放达、不遵礼教的社会风气。向秀及郭象通过其《庄子注》进一步发展了玄学理论，特别是郭象，继承和发了裴頠“有”自生的思

^① 汤用彤：《汉魏学术变迁与魏晋玄学的产生》，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3；唐长孺：《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p.348。

想提出“万物独化”之论，即“有”是惟一的存在，万物“块然而生”，而且都“自足其性”，有其独特的“自性”，其生生化化都是独立自主的，因而万物独化于玄冥之间。郭象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认为“名教”即“自然”。他认为儒家名教思想中的仁义道德、忠恕孝悌，是人的本性中固有的，服从名教礼法就是服从人的“自然”本性，因而名教就是“自然”。

（四）、东晋时期的玄学。东晋时期玄学本身的思想发展已接近尾声，一方面，张湛将何晏、王弼之贵“无”论与郭象的自生独化之崇“有”论调和起来，注《列子》，反映出东晋玄学在贵“无”与崇“有”之间的调和及玄学本身的衰落。另一方面，玄学与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主要是般若空宗之学结合，以玄学老庄之“无”来解佛学般若之“空”，玄佛合流。其代表人物为道安、支遁、僧肇等。佛教之般若之学得到极大发展，出现了“六家七宗”之盛况。其中以道安的本无宗、支遁的即色宗、支愍度、竺法温的心无宗最为著名。

二、经学在玄学展中的作用

首先，玄学的产生及发展总与儒学经学相关联。玄学产生的思想动因之一是儒学的危机，即经学的衰落。同时，从玄学产生的学术渊源来看，玄学的产生也是由经学中新学，即《易》学的义理化发展而来。前面所述儒学的危机中，指出经学的衰落，其表现为经学的谶纬神学化、烦琐化和歧义化，使得儒学严重脱离实际，无力应答现实社会中本已存在并且仍在不断涌现的难题，这就促进和推动了儒学思想以外的各种思潮的复兴，玄学正是